

## 蒋洁敏赴中储棉等8家央企进行调研

■ 本报记者 陈欣媛

8月2日至9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先后赴华孚集团、中储棉总公司、保利集团、农发集团、中林集团、中盐公司、中储粮总公司、中纺集团等8家中央企业,就中央企业如何更好地履行经济、政治和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蒋洁敏听取了8家企业关于改革发展和生产经营总体情况的汇报,重

点听取了企业在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粮食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就相关问题与企业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蒋洁敏充分肯定了8家企业长期以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保障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并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向企业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诚挚的问候和感谢。

蒋洁敏在调研中强调,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和中坚,作为保

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充分认识到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蒋洁敏鼓励中央企业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大胆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到广大职工群众,增强改革的活力和动力。要加强研究,深入探索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方式,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

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蒋洁敏强调,当前要认真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务必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更好地促进企业改革和发展。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要求和部署,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国务院国资委相关领导及办公厅、规划局、评价局、研究局有关负责同志陪同参加调研。

### 封面公司

## 云计算撬动二次转型 中国电信加速去电信化

■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郭奎涛 万斯琴

自从2011年年初中国电信总经理王晓初提出“去电信化”思路之后,中国电信在通信产业链的产品拓展和创新一再提速。

8月16日,中国电信内蒙古云基地·云业务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标志着中国电信内蒙古云基地正式对外提供服务。这是三大通信运营商在内蒙古“最先设计、最先开工、最先运营”的云计算基地,也是亚洲最大的云计算园区。

未来,云计算业务更将与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有机结合,共同推动中国电信成为智能管道的主导者、综合平台的提供者、内容和应用的参与者,完成中国电信继2005年之后的“二次转型”。

### 打造最大云端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企业内部产生的数据和文档从过往的TB开始转向PB级别,传统的IT架构已经不能承载庞大数据应用,可以提供近乎无限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的云计算应运而生。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13年,中国云服务市场规模将达18.3亿美元,同比增长52.5%。而在国际市场,仅仅2012年亚马逊的云服务就达21亿美元,中国这一领域未来发展前景有多大可想而知。

云计算的广阔市场前景迅速吸引了中国的巨头企业布局,不仅有新兴的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也有华为、中兴等传统的IT巨头,一直积极探索转型和拥抱互联网的电信运营商自然不甘落后,本次的内蒙古云基地更是云集了这些云计算巨头。

其实,放眼国际电信运营商,不只是亚马逊搞云计算,AT&T还有欧洲的和日本的通信运营商都已经投入大量资源,大量产业计划进入云计算产业,不管资源性的还是平台型的甚至应用型的都开始用各种方式各种商业模式大力推动云计算发展。

在中国通信运营商领域,中国移动研究院从2007年开始启动了称为“蓝色航母”的云计算研究,并在2010年发布了针对企业的中国移动大云1.0平台,最近几年更是在各地耗资数百亿兴建云计算基地。

经过几年努力,中国电信“4+2”云布局已经完成,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云资源池,“2”指呼和浩特、贵阳南北两个核心。此次投入运营的中国电信内蒙古云基地,则力争通过两到三年建成42个机架,具备超过10万台机架和200万台服务器云托管能力。

目前,首批4座数据中心同期正式投入运营,百度等互联网巨头公司已经入驻。

王晓初表示,内蒙古云基地作为中国电信全网“4+2”云计算数据中心布局的北方核心,将以此为基础树立中国电信互联网数据中心(IDC)集约运营的标杆,为政府、行业客户综合平台提供服务的承载地。通过3—5年的努力,将内蒙古云基地打造为中国最大的云服务基地和亚太最大的互联网数据汇聚地。

### 引领信息消费

利用云计算等新技术提供标准化、模块化、集成化的运营环境,逐步建成开放的基础类、业务类平台,成为综合平台的提供者,这只是中国电信“去电信化”战略的一个缩影。

根据2011年王晓初提出的深化转型思路,除了做好智能管道主导者这一责无旁贷的使命,中国电信未来发展“新三者”的目标还包括,立足自身资源,有选择地发展自营汇聚型内容、应用以及支付和定位等能力型产品,成为内容和应用的参与者。

随着移动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的发展,以内容和应用为代表的信息消费产业迅速爆发,包括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以及基于信息网络来促进消费等三个方面。统计显示,2012年,信息消费规模达到1.72万亿元,同比增长29%,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9300亿元。

8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要求通过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信息产业优化升级,大力丰富信息消费内容等

方式,建立促进信息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将发展信息消费提升内需上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层面。

然而,在互联网内容和应用方面,多年致力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通信运营商正在面临被管道化、边缘化的威胁。随着微信等OTT业务的发展,运营商只能收取微薄的流量费,却无法分享微信们未来的可观收益。

在内容和应用方面,基于应用商店的业务模式天翼空间是中国电信的代表性成果。中国电信和网易共同推出移动即时通讯社交产品易信,具备跨网免费短信、免费电话留言等功能,还将陆续整合中国电信和网易的相关服务,成为与微信、QQ一样的强有力的竞争产品。

网易CEO丁磊认为,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下,整个互联网电信产业开始发生重建,OTT业务的发展正不断拷问相关产业。据悉,双方为运营易信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注册资金为两亿,中国电信为控股大股东。

这只是在个人市场方面,中国电信还在致力于企业级内容和应用的开发。中国电信应用商店运营中心总经理赵锦鹏透露,目前应用商店主要面向2C市场,而2B市场同样前景广阔,这也是中国电信在应用商店转型方面考虑的一个重要方向。

### 全面推动二次转型

这已经是中国电信的“二次转型”了。早在八年之前,中国电信就第一次华丽转型。当时主要的衡量标准是催化业务占比,2005年话音占比80%,转型之后,非话音占比超过80%,转型效果非常明显。



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右)向首批入驻的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李彦宏递交金钥匙,正式交付中国电信云产品。

近年来,随着3G网络和智能手机迅速普及,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也成为“泛运营商”,运营商传统的语音、短信等业务受到冲击。中国电信开始尝试与互联网企业一起合作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推动中国电信的二次转型。

按照中国电信创新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安民在2013年中国互联网大会上的说法,中国电信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再造一个新中国电信,使新业务占比超过50%,这里面包括流量、互联网应用和ICP等三大主流的业务。

除了新业务,在智能管道建设等传统业务方面,中国电信积极落实国家近期提出的促进信息消费、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大力贯彻“宽带中国”战略,在全国范围启动第三次宽带大提速,全面推广家庭百兆宽带。

相比一次转型,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有机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朗的情况下,中国电信的二次转型不仅仅是云计算、互联网等一个个业务的转型,更是一种基层模式上的一些创新的推动和价值链各方共同的协作,最终达到真正的开放和创新。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电信的二次转型思路正在成为中国通信运营商业的趋势。无论是在云计算等平台建设方面,还是在即时通讯产品等内容和应用建设方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都在紧追不舍。

在互联网大会上,李安民和中国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刘昕、中国联通产品创新部总经理李红五更是一致表示,运营商的转型应该成为常态,不应为了转型而转型。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运营商必须跟着技术的发展、行业的进步、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自身战略。

### 观察

## 谨防独立董事由智囊变身“掮客”

■ 丁是钉 张本

在一片质疑声中,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不再准备聘请3位前省部级官员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务。

事实上,人们对中国重汽密集引进“位高权重”的政府退休高官的疑虑,主要是担心在政府权力过大的大背景下,独立董事由智囊变身“掮客”,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

从积极的层面看,政府退休官员的“政治生命”结束并不意味着其经验和能力的消失,通过到企业任职等方式,可以让其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在政府退休高官中,不乏学识水平、管理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人才,并且其经验和精力都处于依然非常旺盛的时期,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高端人才资源。如果他们真的随着告别官位而不再发挥任何作用,不仅对于其本人是严重的浪费,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而言也是巨大的损失。

就是在人力资源相对充沛的发达国家,也有大量政府高官在退休后到企业任职继续发挥“剩余价值”。美国前副财长法拉克·纽曼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他从美国财政部退休先后担任美国信孚银行CEO、韩国第一银行董事、中国深发展银行CEO等众多企业职务。他在深发展银行任职期间,用铁腕推动内部改革,重点推进“人”和“流程”重建,5年间,使深发展的利润增长了13倍,并以1741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成为中国“最贵CEO”。

和发达国家主要利用退休官员的自身价值相比,中国企业更喜欢利用附着在退休官员身上的“官场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能力影响到审批环节。一些企业之所以热衷于聘请政府退休高官到企业任职,正是看中了高官们犹存的“余威”而不是“余热”,希望利用高官们在相应政府机构的影响力和沟通能力,在审批等方面获得各种便利。

显而易见,政府权力过大,特别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过于集中,是退休官员型独立董事由“管理智慧”异化为“权力掮客”的根源。如何克服高官型独立董事价值的中国式异化,让政府官员在退休后释放更大的价值和能量,使原本短缺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由“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是消除退休官员价值异化的治本之策。退休官员之所以还有着巨大的“官场价值”,是因为责任官员的权力过大。所以,约束责任官员的权力比阻止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对于防止企业的权力寻租具有更大的效用。客观上讲,许多退休高官比企业高管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在宏观经济趋势把握、经济政策理解、跨行业和区域交流合作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是企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优势资源。

建立并严格执行相应制度是约束和规范官员型独立董事“掮客”行为的基础“设施”。利用前政府高官进行权力寻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只是发达国家建立更严格规范的制度和处罚措施,防止这一问题的发生。比如,美国政府规定,前官员根据职位高低在1—2年的冷却期内,不得联系原就职部门;日本一度将官员离职后在企业任职情况上升为立法层面进行管制。中国在引进独立董事制度之后,证监会虽然也相应地建立了官员任职回避的制约性制度,却缺乏落实。

改变全社会权力迷信是退休官员注重自身的荣誉和价值生态约束力量。在现今社会中,一些退休官员依然对权力有着格外的迷恋。把能够为企业打通官方渠道,谋求“官场利益”,看做是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所在。建立“以发挥智慧作用为荣,以帮助‘走后门’为耻”的退休价值观,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让退休高官自觉退出“权力磁场”。

因嗜食权力显然不应当是我们对待高官型独立董事的态度和做法。在制度框架内,更大程度利用退休高官的智慧能量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近期以来,中央在约束政府权力、取消行政审批方面做了大量努力,这为独立董事回归自身价值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高官型独立董事由受质疑到受尊重,不仅是其个人价值的回归,而且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潜力。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3年8月13日—8月19日)

